

刘振佳 著

鲁国文化及其孔子

步广题



■ 鲁国史略

■ 东夷文化与孔子

■ 周公与孔子

■ 鲁国国君与孔子

■ 鲁国宗法制与孔子

■ 鲁国经济与孔子

■ 鲁国军事与孔子

■ 鲁国教育与孔子

■ 鲁国文化与孔子

■ 鲁国

■ 孔子

13A05 127

94
K225.03
2
2

鲁国文化与孔子

刘振佳 著

山东友谊书社

1993年·济南



C 014139

鲁新登字12号

鲁国文化与孔子
刘振佳 著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曲阜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9.625印张20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80551—506—9/G·27
定价: 5.80元





前言

鲁国文化与孔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大都惯于从春秋社会乃至西、东周时代大社会环境来观照其人和学说，寻觅之所以产生这一历史巨人和伟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历史根源，阐释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的深层内涵。这固然不乏科学性与历史深度，也有着无可否认的学术研究的合理性。在孔子思想体系的某些方面，唯其如此，也才可获得历史的真谛。如孔子“克己复礼”、“吾其为东周乎”等思想言行；关于春秋一世人心不古，自西周以来君主专制统治无可挽回的崩溃，“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评判；特别是关于“小康”、“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以周公为范本、向往文武之治的德治观，这些都是孔子从西周以来整个社会大局出发，审视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今天，当我们来分析它们的时候，只有将其放到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上，才能洞观出其中的奥蕴，把握其本质。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史学家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许多努力，取得的诸多成果是十分重要的，也弥足珍贵，今后在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发掘下去。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毕竟是鲁国人，他与古鲁国社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极其特殊的深层联系。但长期以来，从鲁国文化这一特定角度去认识、理解、研究孔子，分析其人其学说。这并没

有引起人们的应有重视，多少存在着被人忽略的问题。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是对孔子其人缺乏更现实、具体的了解，研究中更多的接触的是观念的孔子、思想的孔子、神圣化的孔子，而不是生活化的孔子、情感的孔子；对孔子的思想观念大都是从理论原则高度，特别是社会整体历史传承上来作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解释，而缺乏更为具体的、现实的、直接的分析。不能不说这是孔子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将研究孔子的背景缩小到鲁国文化其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它可以开拓孔子研究的视野，将孔子研究中惯常以“家”、“圣”为视点转到以“人”为视点，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历史巨人的常人本性，进一步揭开他之所以会成长为“圣”的现实之“秘”。其次为阐释孔子的政治、哲学、教育等思想确定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现实依据。可以使人更细微而清晰地辨识孔子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合理内核”及其来源，丰富孔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对鲁国文化的理解，深化鲁国史的研究，发掘和清理儒家学派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对探究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构及功能性质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具体考察孔子与鲁国文化的关系，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不仅是多方面的，也是极深微的。古鲁国，孔子生于斯、长于斯、仕于斯、教于斯、死于斯。七十三年生命岁月，孔子在外共计度过了十六年，其余年月均在鲁国。是鲁地的灵性山水和特有的物产养成了他那伟岸高大的身躯；是鲁地强悍子民的气魄铸造出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性格；是鲁地生活风情习俗培育出他那特有的“鲁男子”的习惯心性与脾气秉赋；是鲁地自然景观和历史传统养成了他

“鲁叟”基本品质与德行；是鲁地社会政治氛围和文化气候造就了他“东家丘”式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总之，孔子的基本人格是鲁国文化的“经典作品”。他首先是一个地道的豁达、朴质、深沉的北方鲁国人。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个历史文化巨匠。

不仅如此，孔子学说从其构成基础，到逻辑形式、立论的标准，直至语言表达方式，无不体现着鲁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规范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鲁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和人际世情，正是孔子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教育等观念形成的基础。如“仁”、“礼”，这是孔子学说中最高最深的理论内涵，它们既体现了孔子对现实人格人性的至高追求，也体现出孔子对社会美好境界和政治完善的至终向往。考察孔子思想的形成，可以发现，“礼”、“仁”是孔子学习接受西周以来先代文化制度及观念的结果，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古鲁国历史礼乐文明，特别是由鲁国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所形成的人情世俗、传统习惯，充满着“仁和”与“礼乐”社会精神氛围的反映。尤其是“仁”之中所蕴含着的那种温情脉脉、平和中庸的人道主义质地。决不只是孔子接受先代政治观念，通过对传统“仁”字的简单理性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在更深层次上，乃是他作为鲁国人，经过自小对鲁地人际关系和世态情状的体验，经过了若干年鲁文化的浸染和塑造之后，使他不仅纯然成了一个“仁”、“礼”之人，同时在生活与生命的潜意识之中自然而然有了一种对“仁”、“礼”精神境界的追求趋向。一种发自情感倾向于“仁”、“礼”的非自觉意识。它们虽然是孔子“仁”、

“礼”学说中极细微的成份。然而正是它的存在，才使得孔子能将自我心身与历史的“仁”、“礼”政治概念化而为一，不是迫于什么外在的力量，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使命感和道义心，受着情感意识的自然驱使，使他即使在十分困难，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能不顾一切，作终生不渝的道义追求和“仁”、“礼”观念的张扬。或许我们只有沿着孔子思想学说形成的这一渊源和途径，才能获得关于“仁”、“礼”等观念的正确理解，从而使孔子的学说得到更科学、合理的解释。

关于孔子的生平事业也必须联系鲁国文化进行历史评价。孔子生平活动有做官、修史、制礼乐、教学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仅成就大小不一，有成功也有失败。不过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与鲁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的事业心生成于鲁国，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事业实举开始于鲁国，发展于鲁国，成就于鲁国。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鲁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提供的礼乐文化实物资料，如“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没有鲁国原本在教育上奠定的良好基础，如泮宫历史制度的保存和延续，鲁人重教育的优良传统等。孔子是不会获得如此渊博的知识，也无法进行一些重要历史典籍的编修的，更不会有创办教育设坛授徒的举措。只有从鲁国社会中去寻找造就孔子事业实举的现实性与必然性，才会对孔子礼乐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做出更全面科学的评价，自然也包括他失败的必然性。孔子在仕途上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之所以从政不顺，无法通过参政来实现自己治国

平天下的理想，除了孔子自身素质和秉赋的局限、过于愚执和浓厚的文人气之外，更主要的是鲁国社政中的种种矛盾斗争。鲁君受制于“三桓”家族，宗法制导致极端化的排外倾向，使孔子即使跻身于政界也无法有所作为。后来当“三桓”权力核心发现他不利于自己时，便毫不留情地将其赶出国外，使其呈“累累若丧家之犬”状。孔子在鲁国仕途中必然性的失败，反映了鲁国特殊政权斗争中孔子自身与鲁国社会政治的双重悲剧。

就鲁国文化与孔子来说，还有一个侧面，一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即他的家庭生活及亲人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孔子来说，在血缘亲情基础上所形成的心态意念，不仅是最初的，也是永久的。从一开始孔子便生活于一个悲剧性的家庭中，父亲与母亲不合伦常的结合，孤儿寡母的悲凄，童年的苦楚，成人之后受到的歧视与嘲讽，还有周游列国抛子舍家的寂冷，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给孔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像他这样一个特殊家庭的人所可能有也必然有的心理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孔子终其一生所奉行的法则之一便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所谓“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立志要能自立于世，有所作为，表现出强烈的成就功名、出人头地的思想。有时甚至到了一种蔑视一切、孤高和狂傲的程度。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与之何？”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劲头。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便是由他早年生活处于下层、倍受人歧视形成的逆反心理，一心要发愤图强，居人之上，通过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这是我们研究孔子人格和思想哲学不可忽视的方面。

当然，考察鲁国文化与孔子的关系，决不只是孔子单纯仰承和接受鲁国文化。在另一方面、孔子在接受的基础上，穷其毕生的精力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创造，不只是理论上的，同时也试图以实践构建自己的理想国，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孔子对其之后鲁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以至于使其形成了以孔学为核心，以儒文化为框架，以鲁地人文景观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形态。使鲁文化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化、定型化的阶段。并且由于他的关系，后儒们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终于使鲁儒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此种情形虽然超乎于孔子本人的初衷和想象，非他所能料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还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去看待和研究孔子，去看待和研究鲁国文化。进而去揭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规律性，也为今天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鲁国文化与孔子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发掘与开拓，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写成此书。目的无非是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孔学研究的领域，为鲁国文化研究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并以此为籍，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虽然在写作过程中尽了很大努力，几易其稿，但由于笔者学识能力所限，加之初涉孔学研究这一领域，书中不足与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我殷切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愿以此和大家共勉。

目 录

前言.....	1
鲁国史略.....	1
东夷文化与孔子.....	14
周公与孔子.....	33
鲁国国君与孔子.....	38
鲁国宗法制与孔子.....	47
鲁国三桓政治与孔子.....	55
鲁国经济与孔子.....	63
鲁国军事与孔子.....	83
鲁国外交与孔子.....	95
鲁国文化史典与孔子.....	105
鲁国艺术与孔子.....	115
鲁国教育与孔子.....	125
鲁国地理与孔子.....	139
鲁国风俗与孔子.....	147
阳虎与孔子.....	155
孔门弟子与孔子.....	160
孔子家人与孔子.....	171
孔子文化.....	181
孔子诗作考.....	191

孔子三祖考略·····	196
叔梁纥评传·····	203
颜征在评传·····	208
孟皮考辨·····	213
孔子休妻考辨·····	217
孔子其他家人考·····	221
孔子仕官考·····	226
孔子经济来源考·····	231
孔子私学形态考·····	237
孔子性格述略·····	247
孔子长相考·····	257
孔子饮食考·····	262
孔子衣着考·····	267
附：（一）鲁国与孔子系年·····	271
（二）鲁国三十四君表·····	293
后记·····	296

鲁 国 史 略

古鲁国，作为周代东方诸侯国之一，中经东周、春秋战国，延绵不绝，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249 年，楚考烈王三十二年，秦庄襄王元年）被楚所灭，鲁顷公出国卒于柯（山东东阿），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其间，虽然没有像齐晋那样主盟天下的壮举。也没有像楚秦一样睥睨天下的赫赫威势，然而作为周代东方重国之一，也曾有过极其繁盛的时期，在周末乃至战国的历史舞台上，以它那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地位奏出了一曲又一曲雄浑的历史乐章；培育和造就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历史人物，从而对后来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建国前的历史遗迹

关于古鲁国建国前的历史，目前还正处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阶段。不过根据史书所记传说及近几年发掘地下资料来考察。证明鲁地曾是我国史前文化较早进入文明阶段的地区之一。

早在四五十万年前，作为黄河下游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就已经有人类在此居住了。这可以从新近沂源县骑子鞍山所发现的距今四十万至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沂源猿人”得

到证明（见《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82年5月7日），其年代与北京猿人大体相当。据有关资料记载，解放后，在曲阜境内多次发现化石遗址：1960年，横沟泉地下5米至8米的黄石岩层下，发现了大量树木化石；尼山水库北发现完整的鸵鸟蛋化石。1964年，董庄东大岭发现有大量的象及其它动物的腿骨、脊椎骨、肋骨等化石。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些化石均在十万年以上。在这之后，在距曲阜百里的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乌珠台还发现了一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年）的人类左下臼齿和哺乳动物化石，据专家们鉴定是较北京猿人臼齿进步、属智人牙齿化石（见《山东新泰乌珠台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第11卷1期）。在旧石器的各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古鲁国文化的区域内，都发现了有关的遗迹。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从人类的童年时期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正是他们拉开了东方大地文明的序幕。至新石器时期，闻名遐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心发现地仅距曲阜不足百里。现如今在曲阜四周都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仅曲阜市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二十余处，它们分布在泗河、沂河等流域，其中主要有：少昊陵遗址、西夏侯遗址、果庄遗址、马鞍山遗址等，各遗址中都分别发掘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石器生产工具如斧、铲、凿、镑、研磨石等，生活用具有罐、壶、鬲、豆、杯等，还有陶环、石环等装饰用品。这些遗址，有的属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处于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衔接阶段，有的属于龙山文化。说明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左右，古鲁国一带便是人口密集、生产比较发达的区域。它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

曾一时处于领先地位。

历史传说虽然不是正史，然而从特定角度采摘析理它们并不乏史料价值。在这方面，诸多的历史传说，也为我们研究古鲁国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旁证性材料。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于寿丘”。《阙里志·古冢》记载：“鲁城东北旧曲阜县城北门外，黄帝生处；《世纪》云：‘黄帝生寿丘，亦曰轩辕之丘。’”都把曲阜传为黄帝的出生地。同时古史也称曲阜为“少昊之墟”。《帝王世纪》载：“少昊自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阳山。”颜师古注：“云阳山，在曲阜，邑人谓今陵居一邱为云阳山。”至今曲阜城东还有一处少昊陵遗址（俗称万石山）。据唐兰等人考定，大汶口文化基本“属古史传说上的少昊时代”（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及有关问题的讨论综述》，载《考古》1979第一期）。历史的传说和考古的发现为我们描述古鲁国史前历史面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进入新石器时期后，这里为东夷人的部落集聚地。部落以鸟和太阳等为图腾，他们和周边部落不断发生争斗，最后组合成部落联盟，共同开发和创造出此区域的采集狩猎文明。不仅政治上属于最权威的部落，经济上也是最为发达的地区。

有夏一代，这里为古奄国嬴姓氏族居地。至殷商时期由于此处的繁盛，曾数次作为商朝的国都。《竹书纪年》载：“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故奄。”甲骨文中也有“王入于奄”（《殷墟文字》九页）、“贞，今如奄”（《铁云藏龟》一七九页）等记载，足证其为商都之不忤，在古鲁城内部的古斗鸡台遗址曾发现部分陶器与别处不同，据考证为商人遗物

至于商代在此的更详细情况，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考证。

西周封建定国

西周初年，随着商朝的覆灭和周朝的定国，为了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政治大分封。因为奄是商人故地，四周存在极大的反周势力，加上地处中原与边夷的交接部，是东方的门户。还有这里土质好，极适农业生产发展等原因。周武王便将其胞弟、王国的主要辅臣周公旦封于“少昊之墟”，商奄故地，立国为鲁。以便充分发挥“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作用。在当时国家初创，百废待兴的政治形势下，周公身负重任，无法离朝就封地。在这种情况下，只得让其长子伯禽，一位像他一样忠于周王室，又能征讨领战的年轻将领代父就封。这样一来，伯禽便成为第一代鲁国君主，“是为鲁公”，鲁国从此正式建立。

因为鲁国是周朝的宗亲国，加上周公对周王朝贡献极大，地位举足轻重，所以鲁国创国之初，周王朝曾对它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促进它的繁荣和发展。据《左传·定公四年》记：伯禽至鲁就封时，成王曾赐他“殷民六族”，有“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种手工业奴隶以供他驱使。同时还赐给他众多的文化典籍，让其享有郊祭文王，以后稷配享，立文王庙等特权，在礼仪的规格上和周天子几近相同。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恩赐将其培育成了周王朝东方政治、文化的中心。

伯禽替父就封后，曾以他的非凡才干按照其父离鲁时的